明代研究 第四十六期
2026年06月，頁213-228
DOI: 10.53106/160759942026060046007

113學年度臺灣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

陳詠旻* 整理

1. 王達甫，〈明代吳中士人的仕途遲滯與隱寓調適——以祝允明、歸有光、李流芳的後舉人時期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113學年度，273頁。

   指導教授：李欣錫

   關鍵詞：科舉、舉人、祝允明、歸有光、李流芳、吳中文化

【摘要】

明代士人多將相當長的生命歷程投注於科舉考試，然而隨著人口增長與科場競爭日益激烈，除少數登科者外，多數士人長期滯留於舉業階段。對這些未能及時登第者而言，科舉不僅構成仕途上的延宕，也持續牽動其身分認知、生活安排與生命選擇。學界雖已注意到明代士人在科舉道路上的「遲滯」現象，但對其仕途受阻後的心理轉折、身分調適及其文學表現，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本文以祝允明、歸有光與李流芳三位吳中士人為主要研究對象，聚焦於其取得舉人身分後、仕途仍未順利展開的「後舉人時期」，考察三人如何在持續應試、轉換入仕途徑、地方實踐與逐步疏離科場等不同選擇之間，重新安排才志、身分與生活。祝允明透過對陶淵明、蘇軾等文學資源的重新運用，在仕進受阻之際調整其自我定位；歸有光則藉由地方交遊、應酬書寫與地方實踐，維繫其士人角色與公共參與；李流芳則在停止會試後，逐漸將生活重心轉向山水、藝事與文人交遊，形成不同於前二者的生命安排。

三人的回應方式並不構成由仕進轉向退隱的線性發展，而是分別受其家族條件、經濟狀況、社會網絡、學術志向與身體經驗所制約。其共同之處，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在於皆須面對既有才志與預期仕途未能相接的問題，並透過文學書寫與具體生活實踐，重新理解科舉、仕進與自我身分之間的關係。三人同處吳中文化脈絡，其選擇亦與地方重文尚藝、文人交遊及隱逸傳統密切相關。本文藉由三人的個案分析，嘗試補充既有「士不遇」研究較少處理的舉人階段，並重新思考未第舉人在明代文學史與士人生命史中的位置。

2. 江佩純，〈明代中晚期至清初蘇州文氏家族群體與藝文活動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13學年度，189頁。

指導教授：范宜如

關鍵詞：蘇州、文氏家族、群體、社會網絡、知識圖譜、明代文學

【摘要】

本研究題旨為「明代中晚期蘇州文氏家族群體與藝文活動研究」，嘗試以群體為框架，綜合文學、藝術與生活材料，突破傳統內容或形式的詩文分類；藉由核心人物的代表性著作，亦關注其日常物事與周邊小人物在文化傳承中的作用，著重文化記憶的流布、觀念變遷與藝文互動，嘗試在微觀的作品與個人生命經驗，與宏觀的家族世代、時代社會網絡之間，在文學與藝術的發展之間，辨析創作者筆端的幽微情思。

本論文透過「人、地、物、事、時」為不同章節的主軸線索，結合數位工具，探討文氏家族的文化網絡與藝文風貌。逐步探究：首先，從個人出發，進而瞭解文氏家族組成概況、世代的核心人物及其交遊網絡，家族群體的形成，及整體的行遊蹤跡，藉不同世代作者書寫所及的人際互動與空間之關係，可大致看到文氏家族的高度同質性與地方凝聚力。再者，藉由討論不同世代文徵明與文震亨兩位書寫者齋室園林生活空間中的物質與品賞，關注於作者如何藉由對空間與生活物事的抒寫，表述自我形象、審美品味與價值觀，這些看似獨白自解的文字，很可能也是有其預設讀者，與時代的社會氛圍、鑑藏觀相應的。同時對照圖像材料，並試圖繪製物所形成的知識圖譜，凸顯蘇州地區共通於文學與藝術之間，而又別於他地的「博古」、「尚趣」追求。然後再以書籍編撰的案例討論史學意識與家族傳承的可能關係，並從「詞彙分析」及數位人文的角度，試圖觀察和了解編撰者在字裡行間所流露的意

圖，及其對家族文化傳統的自我肯認。

場所透過群體的活動成為了地方，自然在群體觀看中形塑人文風景，地景承載了群體的認同進入方志，地誌因群體的記憶認同變成符號，符號經群體流轉圖式化與商品化，文本藉閱讀群體構築著空間想像，傳統以時空互動交織成地域文化，地域書寫在歷史中成為群體特色；憑藉著對群體文本空間的多層次再現與詮解，綜合各章指出文氏家族在個人與群體、文本與藝術、日常與史學傳統間，筆端所展現出明清蘇州文人的獨特生命情思、地方意識與文化景觀。

3. 李翊媗，〈十五至十八世紀東亞海洋貿易與社會網絡：以琉球與台灣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113學年度，176頁。

指導教授：翁佳音

關鍵詞：臺灣、琉球、東亞海域、朱印船貿易、朝貢貿易

【摘要】

自宋元時期以來，隨著海上絲路的蓬勃發展，交流貿易逐漸從陸地延伸至海洋。東亞海域因貿易、移民以及官方使節的交流而愈加繁忙。直至明朝初期，由於「倭寇」橫行，明政府實行海禁政策，並依賴朝貢貿易，使東亞的海上秩序發生了一些變化。許多海港國家因此崛起，使得東亞海域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面貌，然十六世紀的東亞海域在歐洲人及其商隊東來；大明帝國於十六世紀下半葉隆慶開海禁後，民間交易由非法轉為合法，與官方的朝貢貿易並行，替大明帝國帶來為數不少的白銀；日本的朱印船貿易盛行，東亞海上貿易的熱絡程度達到高峰。然而，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貿易卻出現了些許不同的變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為十七世紀初期日本隨著德川幕府上臺，強化了「禁教令」，同時也將日本整體發展帶往了「鎖國」的方向發展。也因此使得東亞海域上歐洲貿易主導者由葡萄牙及西班牙轉為以荷蘭為主。而在這一連串的政策及勢力的變化，替東亞海域帶來了許多衝擊，也使得行走於東亞海域上的人、事、物出現了改變。同時這樣的改變也替周邊國家及地區帶來了影響，其中受影響最深的就要屬臺灣及琉球。本論文將透過探究臺灣與琉球所受的影響及彼此間的關係變化，探討從十五至十八（近世）

東亞海域上的風起雲湧。

4. 倪瑋均，〈舉業・結社・家國——復社名士吳應箕交游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113學年度，267頁。

指導教授：侯美珍

關鍵詞：樓山堂集、科舉、貴池、復社、留都防亂公揭

【摘要】

本研究論晚明復社名士吳應箕及其交友情形，透過文集、地方志等記載，梳理吳應箕與各地友人的往來狀況。論文首章說明研究緣起、研究概況與研究方法，並概述吳應箕生平。第二章論吳應箕與劉城之間的友誼，兩人並稱「貴池二妙」，共同備考鄉試，與池州府、貴池縣的儒學教師之互動，呈現明末府縣學教師與生員交游之情形。吳、劉的關係密切，吳死後，劉城與其子劉廷鑾父子為其殮葬，並持續關照吳應箕二子。第三章論吳應箕與家鄉士人的交誼，包含吳應箕的宗親、姻親，以及同鄉其他士人之互動狀況。第四章論吳應箕與張自烈的交情，主要從張自烈與清初刻本《樓山堂集》之淵源、張自烈《芑山集》清初刻本與民國初年豫章本收錄文章不同、吳應箕調停張自烈、艾南英選文論戰之過程等三方面討論。第五章由復社重要事件之一——〈留都防亂公揭〉之始末為主，討論吳應箕與相關文士沈壽民、顧杲、陳貞慧的交往。第六章則擴大吳應箕的交游圈，探究其與江南士人的交往。先論吳應箕參與的復社活動，再分別論吳應箕與浙江杭州讀書社、安徽桐城及休寧士人、江西豫章社、江蘇雲間與幾社諸子、河南商丘雪苑社等文社或士人的友誼，以及吳應箕與相識官員的往來情狀。末章論吳應箕的身份地位、歷史評價，以及論文選題研究所得之學術意義與價值。本論文補正吳應箕年譜及著作繫年，探究吳應箕的交友圈，並依籍貫將吳應箕交游分類，並修正前人研究之誤，有助於明代文人社群研究、交友研究。

5. 張舒雲，〈王船山對「屈陶杜蘇」選評研析——兼論王國維天才說〉，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13學年度，261頁。

指導教授：蘇珊玉

關鍵詞：王船山、王國維、詩學、天才說、屈原、陶淵明、杜甫、蘇軾

【摘要】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別號薑齋，晚年隱居於湖南石船山，學界尊稱船山先生，明清之際著名之思想家、史學家與文學批評家，尤其在詩學理論與詩歌選評方面，兼具理論思辨與實際批評，形成獨特的詩學體系。其詩論兼具儒學、史學、文學及美學等綜合視角，並具體呈現藝術創作中作者、作品、讀者三者之關聯，如：作者之興發感悟、作品之真情實景、讀者之鑑賞接受，皆與王國維（1877－1927）在近代文學批評中所提出之「天才說」，理論之內在精神相聯繫。本論文以王船山對「屈陶杜蘇」選評為研究範圍，檢視王船山之實際選評，是否與其理論批評相呼應？同時，探究王船山天才概念及詩學觀對王國維有哪些層面之實質影響或相互輝映之處？

本論文採用問題法、比較法、詮釋學分析法與歷史研究法，闡明王船山如何透過詩歌實際批評，開展其審美標準。全文共七章，茲將各章研究重點摘要如下：

第壹章〈緒論〉，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回顧學界對王船山詩學的研究現況，並指出過往研究多偏重其理論批評，對於其實際選評部分仍有待深入探討。本論文期望透過對《楚辭通釋》、《古詩評選》、《唐詩評選》、《薑齋詩話》等文本的分析，探討王船山如何透過實際選評詩歌來體現其詩學理論。

第貳章〈「屈陶杜蘇」並提及相關詩學背景〉，考察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所提出之「四天才詩人」（屈原、陶淵明、杜甫、蘇軾），皆為在文體演變的時空條件下，引領風騷之人；並探究其學術淵源及詩學理論基礎。本章對比王船山與王國維「天才」概念及相關詩學觀之異同；較之王國維，王船山更重視儒家詩教意義，如：情思表達的溫柔敦厚和含蓄蘊藉。

第參至陸章，分別論述王船山對「屈陶杜蘇」之批評，自船山選評作品及評語入手，歸納所反映之詩觀及與天才概念相通之處，如：屈原的「非懷抱一己得失」之忠貞；陶淵明質樸自然、平淡有味之真；杜甫詩中景語與情語的統一和諧；蘇軾則是有合乎天才概念的天分、才情和創新，亦因以文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等特質，背離船山天才概念，而受負面評價。各章末節，再對照王船山與王國維詩學觀，論述二人契合點。

第七章〈結論〉，首先，以前述章節之論述，綜整王船山詩學理論與王國維「天才說」之互涉，如：王船山與王國維皆認為理想創作者應兼具先天才情與後天學識修養，並強調人格對詩歌創作的影響，體現「詩品出於人品」的觀點。此外，王船山「情景說」與王國維「境界說」在創作理論上，亦有共通之處。最後，評述王船山論「屈陶杜蘇」之正面意義與侷限。

王船山批評論，兼顧理論與實踐，透過對「屈陶杜蘇」之評價，揭示其詩學思想既承襲中國傳統詩論的核心理念，又展現獨特的批判性與系統性。本論文深化對王船山詩學體系的理解，豐富中國詩學批評的發展脈絡。

6. 陳薇新，〈《牡丹亭》排場及其曲體音樂研究－以《吟香堂曲譜》與《納書楹曲譜》為例〉，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13學年度，275頁。

指導教授：施德玉

關鍵詞：牡丹亭、排場、吟香堂曲譜、納書楹曲譜

【摘要】

湯顯祖作品《牡丹亭》完成於明萬曆26年（1598），創作迄今已逾四百年，現今學界對於《牡丹亭》的探究與搬演可從三方向說明：第一，從文本裡探討《牡丹亭》的故事情節、湯氏的寫作思想；第二，從音樂的角度，探究其曲牌套式的銜接運用；第三，從舞台搬演的角度，探究其文本和曲譜實際運用於舞台上的樣貌。本篇論文即是以《牡丹亭》文本為起點，探其排場結構並延伸至曲牌體音樂之分析，並從中探究曲譜編纂的結果對應於舞台搬演時的運用狀態。

關於《牡丹亭》文本的排場結構與曲體音樂結構，筆者首先綜覽《牡丹亭》文本與曲譜差異之探究，後從《牡丹亭》文本探究其排場結構，最後方是細探《牡丹亭》的音樂結構之探析，期能使本篇研究達到下列四個目的：其一，建構《牡丹亭》全本之排場結構；其二，瞭解《牡丹亭》的音樂編創方式；其三，探究《牡丹亭》文本和曲譜內容的差異，並記錄說明之；最後，以音樂的分析角度探究《吟香堂曲譜》、《納書楹曲譜》二份曲譜在工尺譜和簡譜之間的差異變化，並從中瞭解《牡丹亭》的曲譜分別運用在文本研究與舞台搬演等不同場合時，曲譜因此產生之變異狀態。

筆者期能將上述已梳理並建構完成之研究資料，提供後續研究者從《牡丹亭》文本與曲譜之差異、《牡丹亭》文本研究與舞臺搬演，以及《牡丹亭》曲譜資料的形式差異等三種不同面向，以供後續研究者參考並開展更多主題之《牡丹亭》研究。

7. 熊天涵，〈雅俗之間：晚明嘉萬年間新型文人書畫藝術的區分與雜糅〉，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13學年度，253頁。

指導教授：王采薇

關鍵詞：晚明、雅俗、書畫藝術、場域、品味

【摘要】

文化是一個活躍的體系，需要變化與創新，也需要開放與包容。若想要真正認識和理解一種文化，多元文化的視角是必不可少的考察路徑。晚明是中國社會朝向文化多元發展的一個開端，其階層的結構更為多元，文化藝術的品味也更為豐富多樣，因而需要以更為多元的視角來看待晚明社會與文化藝術的發展。

雅俗之辨一直是文化史、藝術史上的重要議題，而在晚明社會文化發展的變革過程中則更為突顯。本研究通過對晚明新型文人圍繞書畫交往、鑑藏以及雅俗理論所留存的文本與論述進行分析，以書畫藝術作為切入點，管窺雅俗文化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本研究試圖重建晚明藝術場域的部分結構關係，分析場域中關於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產生的競爭與合作；考察晚明新型文人對雅俗這一組具有象徵性之文化符碼的建構；探索晚明藝術場域之自主性的發展和書畫藝術之雅俗品味、理論以及風格發展之間的關係。

研究發現：

（一）新型文人以及與之相關的商人，圍繞各種資本和權力在場域中既有競爭，亦有合作。除了階層與身份維度上的競爭，場域中也有江南與徽州，以及江南內部地域間的競爭，其中象徵資本與權力是爭奪的重點。

（二）雅俗作為一組辯證對立的文化符碼，以區分為目的被建構而成，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在晚明新型文人的具體討論中，雅與俗還可以涵攝為古與今、神與形、虛與實、簡與繁、淡與濃等美學概念，彼此互為解釋與補

充。新型文人在其中呈現出更為雜糅、複合的品味，系統、綜合地建立了一套雅俗區分的標準與典範，以此鞏固他們的象徵權力。

（三）晚明藝術場域的自主性呈現出政治權力支配下降、經濟因素影響增強的趨勢；晚明藝術呈現出對統治權力以及儒家傳統思想的「反叛」，確立了以董其昌為「南北宗」論代表的文人畫理論；晚明主流的藝術風格發生轉變，場域的象徵支配權力在階層結構上有所下移，從中央轉移至地方，從宮廷轉移至民間。

8. 齊冠凱，〈明代前中期官修總志的編修脈絡及流衍〉，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研究所，113學年度，179頁。

指導教授：廖幼華、張秀蓉

關鍵詞：官修總志、大明志、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凡例、天下郡縣志、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

【摘要】

明代前中期的官修地理總志，經由洪武、永樂、景泰與天順各朝的持續編纂與修訂，逐漸形成體例完備、門類繁富的地理典籍體系。洪武時，朱元璋命儒士編成《大明志》，彙總天下州郡形勢與降附始末，旨在顯示新朝對全國疆域及社會的初步掌控。爾後《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出現，利用傳統分野理論並經欽天監觀測調整十二次與二十八宿起訖度數，結合建置沿革的舊籍考訂，使星野分配與行政區劃二者相互驗證，兼具實用價值與象徵意涵。永樂朝兩度頒訂修志〈凡例〉，使地理總志的體例與門類更為明確，並在大規模地理信息搜集的基礎上嘗試編修《天下郡縣志》。此舉兼具學術及政治意圖：既承繼並深化前代地理「門類學」遺產，又統合地方輿地資訊、彰示皇權威望，並供政務系統參酌沿用。至景泰年間，皇權更替，《寰宇通志》的編纂繼承前代修志框架，以期「垂拱而天下治」，然在英宗復辟後，原稿遭修改、毀版，促成天順朝《大明一統志》的成書。兩志相隔僅六年且形製相近，終因政治局勢與參修人員的轉變而形成差異，尤其《大明一統志》在戶口數據與稅糧徵調等門目，始終寄寓朝廷經世致用與士人批評探討的雙重期待。縱觀洪武至天順的修志歷程，明廷一方面汲取前代地理志的編修經

驗，另一方面亦藉由反覆修訂凡例與大規模纂修，將朝廷對地方的管理意志與知識整合需求落實於文本。地理總志逐漸成為鞏固疆域、陳述政績的權威載體，也成為士人群體觀照經世致用的切入點。不論是《大明志》《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還是《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其間所揭示的制度特徵、敘事策略與地方條件的互動關係，充分反映了明代前中期政務運行、學術風氣與社會實態之多重脈絡。官修地理總志既顯示「一統」觀念在王朝意識形態中的持續強化，也在版本撰次與內容增補中反映了明廷對資料嚴謹與地理志創新的追求。由此奠定的制度基礎與編修體例，對明中後期地方志編修與傳統地理著述的發展走向具有顯著影響。

9. 廖鈺婷，〈季彭山龍惕工夫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113學年度，221頁。

指導教授：楊自平

關鍵詞：季本、龍惕、心學、明代經學、戒懼

【摘要】

本研究以明代王門儒者季本（字明德，號彭山，1485-1563）的學術實踐為切入點，檢視陽明心學中良知教義在面對氣質遮蔽與工夫空疏時的困境，並反思其與經學之間的張力。彭山出身陽明門下，著述宏富，兼通六經而重視工夫，與後學偏重直覺本體、忽略涵養的風氣迥異。他特別強調「謹獨」、「惕然」、「讀書」與「注經」，開展出一條由良知推動實踐、落實德性涵養的路徑。雖曾被批評為偏近朱子，或者不明師說，但實際上，他關懷的重點在於矯正王門流弊，使良知之體與氣質、問學能互為表裡。透過統整三者關係，他以「龍惕工夫」建構出一條由本體流行而貫通工夫與詮經的實踐之路，從而為良知教義注入新的發展方向。

彭山之思想主軸，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良知本自圓滿、不增不減，然人處於氣質情欲流行之中，若無持守，則易為所蔽而不顯。為此，他援引《易》乾卦九三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提出「龍惕說」，認為惕並非外加於良知之上的工夫，而是良知靈明在氣質流行中自然呈現的主宰作用。惕之發用，乃良知之光於境遇中自持不失。本工夫的目的，即在

氣血情欲流行時，挺立大本以惕然常覺。如此，良知的道德動力即可不息地推動一切實踐，並引導氣血情欲中本有的善端，成其為德性實現的資糧。

職是之故，彭山的工夫實踐，不僅在於「防失」，更在於「常顯」：於氣血情欲流行的當下，自覺良知內在剛健惕懼的道德動力，使其在動靜往來中恆常挺立。他的謹獨之功，特別強調良知在氣質初萌、幾之初動時必須惕然自覺，確保主宰不失，使道德本體能現於氣質之中。也因此，他並不將氣質情欲視為單純的蔽障，而認為其中亦蘊含善端，若在良知持守之下得以存養，便能轉化為德性發用的資糧。如此一來，「本體挺立」與「善端涵養」形成互為依憑的循環：良知的主宰使善端得以顯現，而善端的滋養又反過來提振良知惕然常覺之工夫，使德性動力綿密不斷，貫通於感物應事的歷程。隨著善端涵養的推進，本體惕然之覺得以持續挺立，展現德性工夫的循環，並由此形成「以知保行」的條理，為知行合一的開展奠定基礎。

這種強調工夫持續歷程的立場，也體現在彭山對「格物致知」的詮釋之中。他認為「物」並非心外萬理，而是良知在境遇中所感之處，因此格物不是向外窮索，而是良知在氣質流行中持其主宰、涵養善端的工夫進路。致知之道，正在於惕然持守，使良知之光於事物感發時不為所奪，而能引領氣質善端不斷轉化為德性之資。由此，格物便不僅是知識的獲取，而是善端涵養與本體挺立相互循環的歷程：良知的主宰使感物不失條理，而善端的滋養又反過來提振良知的惕然常覺。正因如此，彭山進一步強調讀書問學亦當納入此循環之中——經典文字本為聖人良知所寓，讀書非但不礙致良知，反而能觸發良知、涵養善端，使格物與問學相互銜接，共同成為致良知的實踐路徑。

也因此，彭山在不違背良知教「心學即經學」、六經為良知載體的脈絡下，進一步主張六經乃聖人良知之載籍，讀書不但不礙致良知，反而是良知在文字中觸發、涵養、再度惕然自覺的契機。他因而開展出一條以良知為經典詮釋之主體、起點與歸宿的理路，並將訓詁章句視為踐履致知誠意的實踐場域。經典之所以為經，不在於文字之真偽，而在於能否引發良知感通，並於德行履踐的歷程中維持惕然常覺，使實踐不失其節。是以，雖然後世批評其詮釋過度，但在他看來，注經不僅是文字之學，更是良知本體持續推動的德性工夫。故其經學著作，無論是對朱子之說的取捨，或對禮樂制度的探討，

皆體現他以良知為詮釋根據，並將經典義理轉化為德性實踐的立場。由此可見，他視經典不僅為文本之學，更為心體之實踐。

總括而言，彭山之學既非回流朱子，亦未曾背離良知教。他以良知為宗、經典為翼，嘗試建構一套兼顧內聖修持與外王施行的思想體系。其學術實踐不在於復述學案定評，而是在陽明學轉衰之際，為後學開闢一條可資積累、經世致用的實踐通路。此一路徑既具哲學深度，又含具體工夫方法，成為明代心學內部自我反省與轉化的重要環節。是以，雖然本文切入點聚焦於彭山一人一說，但實際的討論，亦進一步延伸至王門「本體與工夫如何貫通」的結構性議題；此一觀察不僅可作為檢視良知教理論與經典詮釋互動的切入點，亦為將讀書問學納入致良知工夫的實踐方法提供新的參照。

10. 鄭世宗，〈明末清初心學視域下的禪僧書法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113學年度，417頁。

指導教授：陳欽忠

關鍵詞：陽明心學、禪宗美學、禪僧書法、臨濟宗、曹洞宗、黃檗宗

【摘要】

唐代書論中，圍繞「心」為核心的書學思想已經逐漸成熟。佛教中的禪宗，又被稱為「佛心宗」，其核心思想在於心之性即是佛性，亦即心即是性，心即是佛。這一以「心」為本體的書學思想和禪宗思想相互交融、相互激盪，成為書法在論述、創作及鑑賞過程中的主流觀念。

明代之際，王守仁將達摩的真髓轉化為心學，儒士和禪僧之間的互動影響促使他們借助禪理來解釋儒家思想，使得心學的影響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進而造就了明萬曆後書法的高峰。此一時期的書風，史稱「變異書風」或「浪漫書風」，在士林中孕育出一批名留史冊的書法能手。然而，對於叢林中的禪僧書法，其實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基於此，本論文有感而發，旨在深入研究明末清初以心為主體的禪僧書法，期望能夠觀察到這一時期不甚顯眼的禪僧群體的書法風貌。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主要聚焦於明末清初時期的臨濟宗、曹洞宗和黃檗宗的十二位禪師，包括臨濟宗的憨山德清、費隱通容、破山海明、丈雪通醉及

曹洞宗的釋靜泚、普荷擔當、無可弘智、今釋澹歸，以及黃檗宗的隱元隆琦、木庵性瑫、即非如一、獨立性易等三大宗派的代表人物。透過對這十二位禪師的書法作品進行深入分析，我們可以探討三大宗派在禪學思想上的異同，進而相應地發展出各具特色的美學思想與書法風格。

在研究中，能夠清晰地觀察到同宗禪師之間在書法美學和風格上所存在的傳承關係。這一過程同時也揭示了禪僧和儒士之間的交流互動，以及這些互動所反映出的時代性和區域性的特徵。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有助於填補明末清初書法史上的空白，也為我們理解這一時期的文化背景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明清鼎革之際，是書法發展史上自主性和開放性最高的時期。在這一充滿變遷的時代，書法藝術以其超越性、空性、無我及無法的形態，穩固自身在文化長河中的地位，並以孤傲的姿態俯瞰歷代先賢的足跡，開創近現代書法的全新格局。這一歷程中，儒士與高僧的貢獻同樣不容小覷。透過本論文的深刻剖析和觀察，希望能引起對被忽視的禪宗美學及高僧書法的更多關注、應用和發展。

綜合這些觀察，本論文不僅探討了明末清初書法的多元性，還揭示了禪學思想如何通過書法這一形式得以表達和傳承。書法作為文化表達的一種方式，不僅僅是技巧的展示，更是心靈的寫照。隨著對這些書法作品的深入研究，我們期待能夠為該時期的書法藝術增添新的視角，並激發出對於禪僧書法的關注與重視，進而促進其在當代的應用和發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明末清初書法藝術的獨特性及其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性。

11. 蘇于喬，〈明代醜書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13學年度，317頁。

指導教授：郭芳忠

關鍵詞：明代書法、醜書、書法美學

【摘要】

中國書壇於二十世紀80、90年代後興起的「醜書」風潮，引起了廣大討論，直至今天仍持續褒貶不一的爭論。明代複雜的時代背景，與書家在傳統

與創新間的探索，和現代有諸多相似之處，明代晚期的浪漫書風與傅山提出的「寧醜毋媚」說，不僅影響清代書家與碑派發展，也經常成為現代醜書向古代書法溯源的理論依據。究竟何謂「醜書」，以及為何至傅山所屬的時代出現一群迥異於前代的創新書風和理論，明代「醜書」的發生和表達為何？是本文想探討的。

本文第貳章「醜書說」透過爬梳古今「醜書」發展脈絡，與探討「醜書」成因與書法中的美醜關係，釐清與定義「醜書」一詞，形成本文概念依據。第參章「明代時代背景與書法發展」討論時代因素與書法發展的關連性，了解明代「醜書」的形成脈絡。第肆章「明代正統書法美學」從審美理論、創作實踐與品評鑑賞分析明代的傳統帖學或復古主義的書法審美。第伍章「明代醜書美學」從明代書論看明人所認知的「醜書」理論與表現，並了解此時醜書家們的探索與嘗試。第陸章「美醜的突圍—奇逸之美」，以徐渭、張瑞圖、黃道周、王鐸、倪元璐、傅山等六家為例，分析其書法理論與表現形式，歸納明代晚期成功的醜書家們以傳統魏晉書法之美為基礎，並修正前期醜書家們的缺失，以個性獨造一己之精神面貌，成功表現在傳統法度之外的奇特書風。

或許明代的醜書在今天看來不醜，甚至相當美，但美與醜本具相對性與變動性，不同時代的審美與書法發展有其個別性，不能單憑今之審美標準一概論之。因此，本文主要從明代的書論，論證明代書法的美學與醜學，以後設的方式冀能為明代「醜書」建立合理的論述體系。

12. 蘇韋菱，〈明代道教莊子學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13學年度，178頁。

指導教授：簡光明、陳佳銘

關鍵詞：明代莊學、道教、陸西星、陳治安、程以寧

【摘要】

《莊子》的文辭奇峭而思想開闊，自古以來即引發文人們持續探討的研究興味，迄今累積豐富的文化成果。在現代學者的重點關注下，儒、釋學者所開拓的詮釋脈絡，已形成數量不斐且具系統性的學術成果，莊學研究中的

道教視域仍處在隱而不彰的景況。在莊子學史中，明代以道教為立場的《莊子》注疏特徵最為明顯，故本論文以之為研究對象，嘗試開拓《莊子》在宗教性轉化歷程中所蘊含的豐富意義。

內丹東派創始人陸西星在《南華真經副墨》架構出一套兼具哲理性與宗教性的詮釋框架，展現其對《老子》與《莊子》義理的體悟，並融合其形上理念與修行實踐。在本體論上，陸西星主張道的本體同時擁有兩種狀態：「道器不相離」，故道會以真君的形態與我暮旦不離，成為修道者重要的修煉根據；當「道器分而為兩」，宇宙創生開始運作，便有主次、本末的差異。其透過「無極」與「太極」主次有別，卻同為道的本體指稱，來說明道本體的樣貌與宇宙創生的概念性模型，並發展出「無極」之上還有一「無無者」的獨特觀點。在理想人格典範上，陸西星提出內聖外王的主張，以師其成心、與道合真作為修養工夫論。

內丹工夫的修煉者陳治安《南華真經本義》透過「吾之病」的內在敘述，反思外物對世人身心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並在《莊子》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從《莊子》尋得了一種觀看疾病與生命的方式，清楚地自我揭開注解《莊子》時獲得疾病緩解的醫病經驗。陳治安「吾何以多病」的自我陳述，與西方精神醫學透過當事人對自身疾病的自我陳述來認識精神疾病的樣貌，有異曲同工之處，故本論文借助病識感（Insight）的觀點，釐清陳治安何以將《莊子》視為治病的藥石，如何討論《莊子》對外物導致身心負面影響的理解。在莊子學史研究中，本論文首次從陳治安「吾之病」的敘述觀察到莊學對精神疾病化的描寫。

程以寧《南華真經注疏》為丹道色彩最為濃厚的莊學著作。其運用注疏的功能差異來展現他的仙道想像，明確指出其命功乃是男女雙修丹法，具有肯定世間財富的修行觀點，以及將自己定位在等同「身在後天而神遊先天」者的神聖位階。

本論文以道教的宗教關懷為主軸，藉由《莊子》注疏的考察，發現明代道教莊子學回應時代的三種立場：陸西星透過《莊子》指出學道者的最高目標在長生久視、聖脩有功，全書一字一意皆在祖述《道德》，對於非聖賢書的批判，陸西星則置身於儒學語境，主張《莊子》與儒家經典可合口而食、

並行不悖；陳治安以為《莊子》文旨在凝神葆息、與天合體，他在不否認《莊子》異質於儒家的立場上，選擇將思考的視野放在儒學價值觀對人類精神的影響性；程以寧因堅定信仰，而深信《南華》為接命法第，旨在教人保全性命。本論文致力從道教關懷開展出不同的莊學視角與詮釋意涵，以拓展莊子學研究的多元與豐富，為具有深度與廣度的莊子學研究風貌貢獻一己之力，期能在莊子學的研究增添一頁新的篇章。

13. 釋自孝，〈晚明袁宏道《西方合論》研究〉，宜蘭：佛光大學佛教學系，113學年度，278頁。

指導教授：萬金川、陳玉女

關鍵詞：袁宏道、西方合論、淨土思想、天台教觀、華嚴法界觀門

【摘要】

袁宏道在經歷十年的狂禪歲月，體察到若不修行，恐墮惡道。因此於萬曆27年（1599）發心撰著《西方合論》，僅以兩個月的時間便已完成。當時袁宏道身居北京官場，士大夫間往往喜談妙悟，卻不務修行，對於持名念佛的淨土修行者，更是心存不屑，認為是老齋公、老齋婆的勾當。就在這樣的宗教氛圍裡，袁宏道試圖扭轉如此偏頗的認知，便於佛教經論及歷代祖師大德的著作中，摘錄出淨土修行的法要，既重視解門的佛法要義，更加強行門的修持理解，亟欲一掃狂禪廢修之謬行。袁宏道在所撰《珊瑚林》中有言：「《西方合論》一書乃借淨土以發明宗乘，因談宗者不屑淨土，修淨者不務禪宗，故合而論之。」故知，袁宏道實欲藉著《西方合論》的撰述，來調和禪淨雙方修行者的偏執。

本論文即就袁宏道撰著《西方合論》的時代背景展開討論，冀以一窺袁宏道撰述《西方合論》的根本動機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本論文從袁宏道個人的生平及生命價值觀談起，續以納入晚明的社會風氣、政治環境、宗教氛圍，作為討論範疇。而歷來《西方合論》的版本非僅唯一，本論文除採行目前存世最早的萬曆31年（1603）《西方合論》古籍刊本外，更參校《徑山藏・西方合論》及《大正藏・西方合論》的版本，以進行義理的探研。《西方合論》所闡述的淨土思想，不僅代表持名念佛的淨土修行得到傳

承，更也為傳統的淨土思想開闢出嶄新的論述格局。尤其袁宏道以「畢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闡述「西方淨土」能貫攝無量法門，其所表述的淨土思想，不僅是融合禪淨而以淨土為歸，也更進一步融攝了天台教觀與華嚴法界觀門。站在淨土思想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可謂厥功至偉。另一方面，在晚明宗教認知紛紜的背景下，《西方合論》的問世，似在佛門救亡圖存的語境中，映射出袁宏道淨土思想的時代價值。